

## 天一阁史事琐考

骆兆平

天一阁藏书的历史，自清初以来，不乏记载，黄宗羲、全祖望为之作藏书记，阮元、薛福成为之编目。近时各大报刊登载的介绍文章更不下数十篇。天一阁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已逐渐为人们所了解。但终因缺乏明代建阁初期时的文献资料，所以对若干史事众说纷云。如果不加稽考，只凭道听途说，主观臆测，便容易张冠李戴，以误传误。为了避免在天一阁藏书史的研究中造成混乱，试举数例，考析如下。

### (一) 建阁时间

关于天一阁创建时的情况，范钦没有为我们留下确切的资料。雍正《宁波府志》称，范钦同里好友张时徽、丰坊曾作过藏书记。但二记不见于其他记载，前人早已疑为误传，今亦访之不得。

清康熙十二年，范钦曾孙光燮（友仲）破戒引黄宗羲登阁。过了七年，黄宗羲作《天一阁藏书记》说：“天一阁书，范司马所藏也，从嘉靖至今，盖已百五十年矣。”他告诉我们天一阁创建于嘉靖年间，而具体年份并未确指。文中既云“盖已”，可知“百五十年”之数系揣测而来。如果从作记时的康熙十八年往前推一百五十年，该是嘉靖八年。此时范钦才二十四岁，尚未考中进士，有书亦不会多，自然没有建造书楼的必要与可能。

康熙十四年，李鄴嗣辑《甬上耆旧诗》，各人有传，在范大澈传中说：“初，司马公归里，于宅中起天一阁，藏书极浙东之盛。”考范钦去官归里，时在嘉靖三十九年冬，归里后建造天一阁，其上限当为嘉靖

四十年（1561）。李鄴嗣原名文胤，与万斯同等求学于黄宗羲，诗卓然成家，学者称杲堂先生，一生重视乡邦文献，其说当为可信。

乾隆四十年，弘历作《文源阁记》，开头说：“藏书家颇多，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，因辑《四库全书》；命取其阁式，以构庋貯之所。既图以来，乃知其阁建自嘉靖末，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。”乾隆帝在写这段话之前，曾派人作了实地调查，详见乾隆三十九年谕旨。文中说的嘉靖末年，即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，天一阁建阁时间的下限当不晚于这一年。

依据上述具体记载，所以我们通常说天一阁创建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。但是，有人不知此说之来历，便主观臆测，如《艺术世界》一九八〇年第二辑载《名重海内天一阁》，文中说：“这座木结构楼阁，于嘉靖四十年（公元1561年）开始鸠工庀材，造了六年，到嘉靖四十五年（公元1566年）竣工。”同年三月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宁波导游》一书也说：“天一阁从明代嘉靖四十年开始兴建，到嘉靖四十五年落成。”而香港《文汇报》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载《南国书城——天一阁》一文，则以为“始建于嘉靖四十年（公元1561年），五年后落成。”同年十月十日《光明日报》上《南国书城——天一阁》一文更说：“嘉靖四十年范钦开始兴建天一阁……嘉靖四十五年天一阁建造完毕，历时四年。”上述所谓“造了六年”，“五年后落成”，“历时四年”，都是没有根据的。

又如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向国外发行的宁波风光照相名信片，在用中、英、日三种

文字书写的说明中写道：“城内天一阁，建于公元一五一六年（明正德十一年），是我国最早的藏书楼之一。”正德十一年，范钦才十一岁，若说此时已建造藏书楼，那更是无稽之谈。

## （二）命名由来

范钦字尧卿，号东明，所以他的藏书处初名“东明草堂”，这有藏书印章可证。后来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加，便在住宅的东面建一书楼，称天一阁。

乾隆三年，全祖望《天一阁碑目记》中才说到天一阁命名的由来：“阁之初建也，凿一池于其下，环植竹木，然尚未署名也，及搜碑版，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，元揭文安公所书，而有记于其阴，大喜，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，因即移以名阁。”后来，他在《揭文安公天一池记跋》文中还进一步阐述了天一阁命名之旨：“张真人龙虎山天一池，揭文安公为之记并为之书，别有天一池三大字。吾乡范侍郎东明筑阁貯书，亦取以水制火之旨，署曰：“天一阁”。而凿池于其前，双勾文安三大字，将重摹上石，未果而卒，今其旧刻归于予。”

然而，今人往往未读天一池记原文，便胡乱引证，如《宁波导游》和《光明日报》上那篇《南国书城——天一阁》文章都说：“有一次，他翻阅碑帖，看到揭傒斯书写的《龙虎山天一池记》碑帖中有‘天一生水、地六成之’的话，受到启发，就将书楼取名为天一阁。”其实天一池记碑文只说到“天一生水”，而没有“地六成之”，拓本影印件见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《金石书画》第五十六期，碑文收入《龙虎山志》卷十四。

《天一池记》撰于元至正七年，谓：“……吴公凿大池宫南门之外二十步，纵二百尺，衡倍之，深二寻去其一尺，龙石为

防，而阑口其上，外为周垣，而缺其北涯，以纳拒焉……请名吴大宗师，宗师曰：‘夫生天地者道也，载天地者气也。无形曰道，有形曰气。气者道之用也，道为万物之祖，气为万物之母，道与气一而已，故天一生水。一者万物之所由生也，一之生无穷，万物之生，生亦与之无穷，故一者万物之终始也，宜名曰天一之池。因其静可以见道之体，因其动可以见道之用，一静一动而生变化，不可端倪，而莫不本乎一也。’既书以名之，又请余从而记之……”

“天一生水”之说，出自汉《周易郑康成注》一书，该书系辞云：“天一生水于北，地二生火于南，天三生木于东，地四生金于西，天五生土于中。阳无耦，阴无配，未得相成。地六成水于北，与天一并，天七生火于南，与地二并，地八成木于东，与天三并，天九成金于西，与地四并，地十成土于中，与天五并也。”阴阳五行之说颇为玄奥，一般人不易理解。弘历《文源阁记》和阮元《天一阁书目序》都认为天一阁的建筑上通为一，下分六间，皆有精义，盖取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之意。

所谓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只是后人的一种简写，故《文汇报》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《记天一阁》和《浙江图片新闻》一九七九年第六期《重游天一阁》文中说，范钦“有一次披览古帖，看到汉代郑玄（康成）注解《易经》中有‘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’的话，遂决定以天一为书楼命名。”显然也是错误的。

## （三）书楼形制

天一阁藏书楼是木结构建筑。创建后经过一百余年，至康熙初，范钦曾孙光文在阁前增构池亭。<sup>①</sup>康熙二十五年，光燮归里后，见屋宇已经陈旧，便“葺天一阁诸屋，以安祖泽。”<sup>②</sup>

乾隆四十年，弘历《文源阁记》说，天一阁“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，虽时修葺，而未曾改移。”仍然保持明代藏书楼的原貌。所以，我们只要考查这一时期的记载，就可搞清楚天一阁书楼的形制。

弘历曾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派杭州织造寅著专程到天一阁作调查，六月二十四日上谕：“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，纯用甌甃，不畏火烛，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，其法甚精，著传寅寅著亲往该处，看其房屋制造之法若何？是否专用甌石，不用木植？并其书架款式若何？详细询察，烫成准样，开明丈尺呈览。”不久，寅著奏称：“天一阁在范氏宅东，坐北向南，左右甌甃为垣，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，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。共六间，西偏一间安设楼梯，东偏一间以近墙壁，恐受湿气，并不貯书……阁前凿池……阁用六间，取‘地六成之’之义，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。”这便是藏书楼形制的最早记载。

同是乾隆年间纂修的《鄞县志》，卷首有木刻《天一阁图》，更形象地记录了书楼外部的面貌：屋顶为硬山式，阁前阶沿设有栏杆。

乾隆帝“数典天一之阁”，建造文渊、文源、文溯、文津、文宗、文汇、文澜七阁，以贮藏《四库全书》。但是，若以文渊阁为例，与天一阁比较，二者的差别甚大。文渊阁也是一列六间，采用偶数，外观分上下两层，阁前凿池蓄水。在全体平面布局上它虽保持了天一阁的主要特征，但内部结构与天一阁有很大不同，它利用腰簷地位，增为上中下三层，因此体量比天一阁高大。同时在外观上，屋顶改硬山式为歇山式。这些改变，与藏书量比天一阁多有关，更要顾及宫廷建筑群的环境协调。现存的文津阁、文溯阁、文澜阁均与文渊阁大同而小异，一扫民间藏书楼的风貌。

现在唯一可以和天一阁相印证的，只有

宁波卢址的抱经楼。它建于乾隆四十二年，完全摹仿天一阁书楼形制，无论内部结构和外观，均与天一阁一样。今楼前池石已毁，书楼依旧，楼下中厅搁栅上所绘水波纹尚清楚可见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至道光九年(1829)，天一阁已历经近三百年的风雨侵袭，此时，范氏后人竭尽全力，发起了一次大修。据周彦《范氏重修天一阁记》，当时范筠甫、范邦冉等“节省祀田之余，鳩工庀材。上自栋瓦，下至阶庭，左右墙垣，罔不焕然一新，阅八月而告成。明年，更复修砌岩石（假山），濬深池水，所费计千余缗。”同年八月，范氏禁牌中也说：“书阁建造，历有年所，虽时经修理，总恐日久难支。今春会同子姓，筹费鳩工，需用繁多，程工浩大，后人因修理之维艰，益思创建之非易，宜各恪遵勿替。”此次大修，亦未改变书楼的面貌，我们可以从同、光间湖北祝永清绘制，一九三五年摹刻上石的《天一阁图》中知见一般。

此后，因财力所限，天一阁维修工程，往往借助外力来进行。咸丰十一年，天一阁书被窃，阁墙残破。至光绪十年，宁绍台道薛福成备兵东浙，政务余闲，加意于阁书，重编见存书目，并“以俸钱葺治其屋。”<sup>③</sup>民国初年，天一阁藏书又大量被窃。十七年，林集虚编《目睹天一阁书录》，与范氏后人商定“开阁以十天为期”，其时“阁中正柱为虫蚀，欲修乏资，召工估计，需银百有余版，集虚欣然任之。”<sup>④</sup>以此作为交换条件。

一九三三年九月，天一阁遭台风袭击，阁东墙圯，鄞县文献委员会发起集资修葺。此次落架大修，书籍临时迁藏范氏诒穀堂，前后历时三年，用银一万四千余元。拆除底层簷下木栏杆，增设上层簷下铁栏杆，改筑围墙，濬天一池，修前后假山。阁前右壁补筑一亭，嵌《丰坊临兰亭》刻石，因名兰

亭。阁后移建尊经阁。故面貌有所改观。但书楼平面布局，梁柱结构及硬山式屋顶等基本建筑特征仍保持原状。

解放以后，虽然多次维修，仍遵循“保持现状，维护原状”的原则。但近人不知其详，竟有据《西厢记》插图来寻踪问迹者。原来，是《文汇报》上《记天一阁》一文告诉读者：“数十年前，郑振铎同志也曾来过这里，当时他这样写道：‘屋顶作半穹形，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，古趣盎然……’”这篇文章被收入《新华文摘》，其中这段话又为《浙江图片新闻》上《重游天一阁》一文所转引，给了人们较深的印象。

考郑振铎的这段话，见于《录鬼簿》一书的跋文。文中记叙了他与赵斐云、马隅卿两先生南下访书的情景，“……此数日放诞高论，旁若无人，自以为乐甚。夜寓隅卿老宅东厢，屋顶作半穹形，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，古趣盎然。予尝笑谓二君曰：‘是入王伯良校注《西厢记》之画中矣！’隅卿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，而终格于范氏族规，不得遂所愿，盖范氏尝相约，非曝书日，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。”可知，这一次郑振铎并未登天一阁，所指半穹形屋顶的建筑是在“隅卿老宅东厢。”引文与原文一对照，张冠李戴的毛病便显而易见。

#### （四）藏书来源

天一阁藏书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：一是范钦足迹所到之处留心收集。他曾在湖北、江西、广西、福建、云南、陕西，河南等省做过二十多年的地方官，足迹几乎遍及当时半个中国，因此，有机会收集各地的乡试录、地方志、诗文集等文献资料。二是向藏书之家借抄。他曾向丰氏万卷楼抄书，又与王弇州有藏书互抄之约。王弇州答范钦书云：“所谕欲彼此各出书目，互补其阙失，

甚盛心也……长夏小闲，当如命也。”范钦《吹剑录外集跋》云：“是书，余借之扬州守芝山，冗病相缠，委致几阁，亦且数月，夏五下旬，乃抽闲录之，四日而就。念予善忘，掷笔固不能一一忆也。辛亥岁，甬东范钦识。”<sup>⑤</sup>可见当时借抄之广，不限于一时一地。三是购入丰坊万卷楼、袁忠徹静思斋等故家散出之书。全祖望《天一阁藏书记》说：“是阁肇始于明嘉靖间，而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，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故物也。”万卷楼遭火灾，藏书所存无几，幸存之余即归天一阁。后来丰坊穷困潦倒，其碧沚园和万卷楼刻石均归范氏，他曾写道：“碧沚园、丰氏宅，售与范侍郎为业，南禺笔。”<sup>⑥</sup>四是得自友朋所赠，如钱大昕在编《天一阁碑目》时会见《赵圉令碑》背面范钦手书“凤洲送”三字。<sup>⑦</sup>

现在尚须进一步考证的是范钦天一阁与范大澈臥云山房之间的关系。

《文献》第一辑载《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图书馆入藏的一批善本书》一文，在介绍《佛遗教经》宋拓本的流传经过时，说此本“曾是明代永乐宣德间官吏袁忠徹的家藏，后归范氏天一阁。范大澈在其所著《碑帖纪证》一书中曾有著录。”但是此本不见于《天一阁碑目》，范大澈《碑帖纪证》是这样记的：“……遗教经唐释道常书也。余得宋榻一帙，有剝蚀处，并有宋元及国初人题跋，真奇物也，又得完好一帙，似赵子昂临，俱袁尚宝忠徹家物。近见吴人刻之以射利者，竟不知何人书，要之，不曾见此二种也。”观此可知，《佛遗教经》从袁忠徹家散出后归于范大澈，并非归天一阁。又如《西泠艺丛》第四期，在介绍《集古印谱》一书时，一方面引录乾隆间蒋学鏞的跋文，说大澈“性喜收藏古人公私名印，遂编有《集古印谱》。”<sup>⑧</sup>而另一方面却说大澈“晚年遂将天一阁藏印编集成《集古印谱》”。（蒋学鏞《鄞志稿》说得明白：“大澈集得秦

汉以来铜玉印章数千，著为印谱。”）显然《文献》和《西泠艺丛》的作者不了解范钦与范大澈的关系，因而误认为范大澈的收藏即天一阁的收藏。

溯其源，最初混淆二者关系的是清乾隆四十年编印的《钦定天祿琳琅书目》，卷九《初学记》提要谓：“有范大澈印，按后《艺文类聚》中亦有其收藏印记，称‘四明范生’，当属范钦后人，亦天一阁所藏也。”后来，一九三七年《文澜学报》第三卷第一期《两浙藏书家印章考》，便误断“范大澈字子宣，钦子。”近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浙江文献丛考》一书，亦未加细考，称“范钦歿，其子大冲、大澈克承先志，续有增藏……”都把范大澈说成是范钦的儿子。至今两个多世纪来一误再误，未曾得到纠正。

范钦和范大澈都是明代的藏书家，他们是叔姪，并非父子。大澈字子宣，又字子静，号讷庵，“从仲父钦游京师，官鸿臚寺序班，使琉球、辽东、朝鲜等处，玺书七下，进秩二品，月俸所入辄以聚书，闻人有抄本，多方借之，长安旅中，尝雇善书者誊写，多至二三十人，年六十七致士，筑室郡城西郊，翻经阅史，品画评书者垂二十年，万历庚戌（三十八年）九月八日卒，春秋八十有七，所著有《灌园丛谈》，《卧云山房遗集》”。<sup>①</sup>

范大澈与范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，但有时也因书籍的事闹别扭，生闷气，“初司马公归里，于宅中起天一阁，藏书极浙东之盛，子宣数从借观，司马不时应，子宣拂然，益遍搜海内异书秘本，不惜重值购之，克其家，凡得一种，知为天一阁所未有，辄具酒茗佳设，迎司马至其家，以所得书置几上，司马取阅之，默然而去，其嗜奇相尚若此。”<sup>②</sup>大澈藏书处称卧云山房，“得秦汉以来图书至四五千有奇，”<sup>③</sup>又收藏许多名碑古帖和公私名印。因藏书早散，故后人多知有天一阁，而不知有卧云山房。

那么，卧云山房藏书是否后来归入天一阁了呢？杭州大学历史系编印的《中国目录学史》认为：“范大澈收藏之盛，签题装帧之美，也不减于范钦。后并于天一阁。”此说源出一九三二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《天一阁藏书考》，谓“阮元《天一阁书目》已并合大澈之藏，故阮氏《天一阁书目》所列收藏印记，即有大澈之印。”这也是一种误传。考大澈藏书印有：“范大澈印”、“子宣父”、“西园”、“生平乐事”、“沧瀛外史”、“范氏子宣”、“明州范生”、“卧云”、“范大澈图书记”、“范伯子”、“四明真逸”、“南海钓者”、“典属国印”、“典客侍从之臣”、“句章灌园叟”、“金峨玉几”、“丹山赤水”、“宝墨斋”等。<sup>④</sup>细检阮元《天一阁书目》及现存天一阁藏书，均不见范大澈的上述印记，合并之说，文献无征。

其实，当万历十三年范钦去世时，范大澈尚健在，卧云山房藏书正当兴盛之时。万历三十八年大澈去世，此时范钦之子大冲早已去世八年。在这期间，不可能把卧云山房藏书并入天一阁。明末清初时期，天一阁藏书增减变动不大，更无购入卧云山房藏书的记载。康熙初年，李鄴嗣曾去卧云山房看书，他说：“余家与鸿臚世有姻。余少时曾见其印谱一、二册。及选《耆旧集》，往其家借书，虽残失过甚，尚有存者。”又说：“今日追慕其风流，不可复见矣。”可知，卧云山房藏书自大澈歿后便陆续散出，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，便已“残失过甚”。至乾隆时“已不可问矣。”<sup>⑤</sup>如《初学记》和《艺文类聚》皆流入清宫。

## （五）藏书印记

收藏家的印章不仅是藏品归属的主要标志，而且也是后人考查藏品流传过程的重要佐证。正确识别天一阁的印记，对于确认散

存的范氏旧藏和考证书籍版本都是有益的。举例来说，一九八三年，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其铤和上海文学编辑部陈凤金两先生集校《刘子》，他们见到一部《刘子》的无阑抄本，上钤“天一藏书”朱文方印，当时不知是否天一阁流散之本，寄来书影一页征询意见。经笔者考查，此印不是天一阁藏书印；天一阁散出的《刘子》原藏本为蓝丝阑抄本，此无阑抄本当非天一阁旧藏。后来，又经顾廷龙先生进一步考证抄本上的另外两颗印章，认为东莞莫伯骥号天一，此“天一藏书”印实为莫氏藏书章。<sup>⑭</sup>这样，就为《刘子》版本的研究提供了帮助。

最早著录天一阁藏书印的是嘉庆十三年阮元等所编《天一阁书目》，后来又有一九二八年林集虚编《目睹天一阁书录》和一九四〇年冯贞群编《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》。但是这三种书目只记录某书有某印，而并不注明某印为某家，因此要辨别清楚是那家的藏印，就不那么容易。如叶昌炽的《藏书记事诗》和近年出版的《浙江文献丛考》，都把明代袁忠徹的“静思斋”印章误认为是范氏天一阁的藏章。何况天一阁的藏书上有几代人所盖的印章，要区别那是什么人的藏印，尤其是那些闲章，同样是不太容易的。如《记天一阁》一文，就把范大冲的“小桃源里人家”印，说成是：“范欽有一方印记，篆着‘小桃园里人家’，可见他在月湖深处营建书楼是很得意的。”源字又误作园。

研究天一阁藏书印记，可以从印章内容及共合用关系上来识别。《藏书纪事诗》首先分别著录了范欽的九颗和范大冲的六颗印章。冯贞群在《范欽传注》中增补了不少，同时又在范光文、范正格、范邦绥等人的传注中著录了他们的印章。但与阮目对照，仍有错漏。如“四明山水野人手印”、“四明范氏家藏”、“子受”、“范氏子受少明图书印”、“四鸟楼”、“崑崙山人”（小印）、“范氏子受家藏”、“十洲三岛人

家”诸印均失载。冯目中“范氏公定”朱文方印又误作“范氏岳定”。今条理如下，凡阁内存书中可见者注明印式，以示区别。

范欽，正德元年九月十九日生，万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卒，年八十，其印曰：“范欽私印”（白方），“范氏尧卿”（朱方），“东明山人之印”（朱长方），“东明山人”（朱长方），“天一阁”（朱长方），“天一阁主人”（朱长方），“古司马氏”（朱方），“司勋大夫”（朱方），“范氏图书之记”（白方），“四明范氏图书记”（朱长方），“范”（朱圆），“万古同心之学”（白方），“和鸣国家之盛”（朱方），“四明山水野人手印”（白方），“尧鼎”、“范氏安卿”、“甬东范尧卿氏”、“东明”、“东明外史”、“东明草堂”、“一吾庐”、“七十二峰”、“壬辰进士”、“壬辰子大夫”、“司马之章”、“甬东范氏家藏”、“四明范氏家藏”、“范氏看画记”、“子子孙孙永传宝之”、“人生一乐”，共三十颗。

范大冲字子受，欽之长子，县学生，入太学，授光祿寺大官署丞，嘉靖十九年三月十九日生，万历三十年四月四日卒，年六十三，其印曰：“范大冲印”（朱方），“范大冲印”（白方），“少明”（朱方），“范伯子子受”（白方），“范子受父”（朱方），“范氏子受”（白长方），“四明范大冲子受氏印”（朱方），“子受”（白长方），“崑崙山人”（小朱方），“崑崙山人”（朱方），“太白山人”（白方），“龙山山人”（朱方），“少明草堂”（朱方），“三友堂”（朱方），“碧沚书堂”（白方）“渔湖丹室”（朱方）、“青松白鹤山房”（朱方）、“小桃源里人家”（朱长方），“宋尚书裔”（白方），“清宁宇宙中人”（朱方），“诗言志”（白长方），“范氏子受少明图书印”（朱方），“四鸟楼”（朱方），“西郭草堂”、“范氏尚友古

堂书画”、“范氏子受家藏”，共二十六颗。

范大潜字子昭，号继明，钦之次子，万历壬子应天副举拣选教谕。嘉靖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生，万历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卒，年四十二。因大潜先范钦三月而卒，藏书为大冲继承，故书上所盖印章稀见，其印曰：“范氏子昭”（朱方）、“景泉”（白方）。

范汝楠字公定，一字梁甫，号九如，钦之孙，大冲之长子，府学生，入国子监。万历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，天启二年十一月二日卒，年四十二，其印曰：“范氏公定”（朱方）、“九如”（朱方）、“十洲三岛人家”（白方）。

范光文字耿仲，号潞公，钦子曾孙，汝楠之长子，顺治六年进士，授礼部主事，迁吏部文选司，八年为陕西乡试正考官。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八日生，康熙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卒，年七十三，其印曰：“范光文印”（白方）、“光文”、“潞公”。

范光燮字友仲，一字鼎仍，晚号希圣老人，钦之曾孙，汝楠次子，恩贡生，康熙十五年为嘉兴府学训导。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六日生，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卒，年八十六，其印曰：“范光燮”（朱方）、“友仲”（白方）。

清康熙以后，天一阁书逐渐由入藏转向散出，范氏后人在书上加盖的印章极少。咸丰年间，藏书被窃，范钦十世孙邦绶“急借资赎回，始稍稍复归。”<sup>⑤</sup>其子彭寿参与藏书整理，偶书“东浙藏书第一家”白文长方印。

民国三年，天一阁藏书又大量被窃，范氏后人玉森、盈炉等奔走官厅，呈请返还。“范氏以无印记，讼之不胜。”<sup>⑥</sup>此后，凡窃余之书，每册首皆盖木刻“范氏天一阁藏书”篆书朱文方印。

以上总计藏书印六十九颗，据冯目附录，范光文尚有“茗园”、“朝剑”、“风雅鹑”三印，范彭寿有“寅卿”印，范玉森有

“范玉森”“锦文”二印，因书目无记载，疑非藏书印，故不计在内。

明清时期，钤在书上的天一阁藏印不多，阮目著录（除进呈书外）三千七百十四部，其中盖印的仅一百另八部，不到百分之三。林目著录一千四百十二部，盖印的六十八部。冯目著录（除少量清代续增书外）一千五百九十一部，盖印的除木刻“范氏天一阁藏书”印外，只有七十三部，计存印四十七颗。不过《吉林图书馆学会会刊》一九八一年第五期《范氏天一阁藏书印考》说：“冯贞群编《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》时阁中却只见印二十颗，被冯氏收入《附录》中。”亦未免失察。其实《附录》所收印谱仅举数例而已，在印谱同页的书影上，尚有“范钦私印”，前几页书影又有“四明范氏图书记”、“范氏天一阁藏书”、“古司马氏”诸印。更多的为印谱所未收。

天一阁藏书中最常见的印记是“天一阁”和“范氏天一阁藏书”二印。值得注意的是这二颗印章原件至今尚存阁中，所以书上“天一阁”之印，并非均为范钦所钤。

## （六）管理旧制

自范大冲以后，天一阁藏书就不再作为财产再分配，而归其子孙共同所有。因此就产生了与家族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，如规定：子孙齐集，方得开锁；不得无故开门入阁；不得私领亲友登楼参观和擅开书厨；不得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；倘若有人把书籍拿出去典押，必定严加惩办等等。其目的是做到“书不出阁”，防止藏书为个人所占有。这样严格的规定，竟成了数百年来藏书不被瓜分荳蔻的重要保证。但是，把书籍幽囚闭禁起来，必然会影响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。这种管理旧制是在一定客观历史条件下产生的，对此，我们自然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介。

《记天一阁》一文说：“史学前辈谢国

楨老先生在天一閣的走廊里，捧着罕见的古籍，一坐数小时，边考边录，八旬之人，面无倦容。在散步时，他老人家跟我说：“解放前，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来天一閣考察，吸取了郑振铎先生碰壁的教训，宴请范氏合族十二房一百另二户方得登閣。今日我平生第三次登天一閣，看到古代书籍保存得如此好，工作人员招待得如此周到热情，国家有幸，本人有幸。”这件趣闻，所记就与事实有出入。此文发表后一个月，笔者赴京开会，当时赵万里先生正养病在家，他让北京图书馆同志转告：“《记天一閣》一文说我‘宴请范氏合族十二房一百另二户方得登閣’，这是没有的事。”

其实，赵万里先生早在《重整范氏天一閣藏书纪略》中已说得很清楚，当时“相约七月二十五日起以一星期为限，开閣观书，在此期间，所有监视我们的范氏族人膳食费都由我负责筹款担任，但须向鄞县县政府补递一封公函，以便据以备案。”协助编目的朱赞卿先生也说“一九三三年秋，赵万里重整天一閣见存书目，余为之邀集写官五人，并几编写，挥汗如雨，历七日之久。”<sup>①</sup>并无宴请的记载。可知当时赵万里先生付出的只是书楼管理人员的七天伙食费。

考范氏世系，亦无“合族十二房”的记载。二世大冲之后，三世有男丁汝楠、汝桦二人，四世光文、光燮、光交三人，五世正格、廷辅等九人，六世从益、从夔等十八人，七世永泰、永恒等二十七人，八世懋柱、懋敏等四十四人，九世与龄、遐龄等四十九人，十世邦甸、邦绥等六十二人，十一世多福、彭寿等七十八人，十二世玉森、盈涟等六十五人，十二世后不及细载。从一九三四年范氏子姓参加“重修天一閣委员会”的人数来看，当时住在本地的仅十余户而已，

余均迁居在外。

光绪间，缪荃孙《天一閣始末记》曾说：“光绪三十四年，内兄夏闰枝守宁波，余欲登閣观书，闰枝于八月间与范氏订约，至次年始得复。司马后人一百有二家须均允乃得登，旧例也。”不知“一百另二户”之说是否源出于此。

说来也巧，一九八一年谢国楨先生再次访閣，他看了《记天一閣》原文，摇摇头说：“我没有讲过这些话”。当天，谢先生挥笔题了“天一閣”三个大字，边款云：“楨因故友郑西谿、马隅卿、赵斐云诸先生之启发，得以数登天一閣。后又识孟冯颢、朱赞卿先生，得以校辑谢山《结埼亭集》。今又承嗣斌诸同志热情接待，情不自己，书此匾额，效墨卿遗法，愧不成字，殊为赧赧，不足以补壁也。八一年四月三十日，八十老人谢国楨，时游四明。”

## 附注

- ①⑩⑪清李鄴嗣《甬上耆旧诗》
- ②清范廷文《希圣公小传》
- ③清钱学嘉《天一閣见存书目跋》
- ④林集虚《目睹天一閣书录缘起》
- ⑤江苏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《善本书题跋辑录》
- ⑥清徐兆燾《四明谈助》
- ⑦清钱大昕《天一閣碑日记》
- ⑧清蒋学镛《范氏集古印谱跋》
- ⑨清郑梁《讷庵范氏传》
- ⑫清乾隆《钦定天禄琳琅书目》卷九
- ⑬清钱维乔《日湖访古录》
- ⑭林其鏞、陈凤金《刘子集校前言》
- ⑮清范彭寿《重编天一閣见存书目跋》
- ⑯冯贞群《鄞范氏天一閣书目内编凡例》
- ⑰朱赞卿《驳天一閣五劫文》